

# 从哲学思潮的形成反思西方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哲学基础

李力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人文、科学、理性和功利是西方哲学和思想史中的重要范畴。自由和理性作为人之为人的基本规定性,同时也是人文和科学的哲学本质。可从认识论和本体论两个层面来考察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在认识论层面,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分歧主要表现为对人类认知方式和认识能力的不同理解;在本体论层面,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对立表现为对自由和必然的各自追求,最终本体论的不可调和性决定了认识论上的差异。上述四种范畴根据各自的内涵发展为相应的哲学思潮,但均可归纳为理性和自由两种属性。它们作为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哲学基础,制约和影响西方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发展方向和进程。

**关键词:**人文;科学;思潮;高等教育近代化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2614(2010)01 - 0087 - 05

人文、科学、理性和功利是西方哲学和思想史中重要的哲学范畴,之所以称其为哲学,主要是因为,首先,这些概念之所以能够相继发展成为可以持续影响和支配近现代社会进程的重要哲学思潮——人文主义、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原因就在于“时代思潮是由社会的有教养阶层中实际占统治地位的宇宙观所产生的”<sup>[1]</sup>。无论是人文、科学,抑或是理性、功利,最初都是作为哲学范畴被进行系统的深入的思辨和逻辑推理,进而使得它们得以发展成为具有独立内涵和体系,能够左右一个时代发展进程的思想观念,最终为进一步形成思潮进行铺垫;其次,这些哲学思潮一经形成就不可避免地对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人类社会和生活的重要部门发生持久影响,教育尤其是近现代高等教育自然也不例外,反映在高等教育领域,明显地表现为上述哲学思潮对高等教育近代化过程的持续制约和影响。“教育哲学是对教育思想前提的反思”<sup>[2]</sup>。因此,有必要将上述哲学思潮在哲学史中加以客观还原,以便于更好地理解作为思想史重要内容的哲学思潮与高等教育近代化的互动关系。

## 一、自由:人文的哲学本质

“人文主义一词的英语原文 humanism 是从德语 Humanismus 译过来的,而德语该词又是德国一位不甚著名的教育家 1808 年在一次关于希腊罗马经典著作在中等教育中的位置的辩论中根据拉丁词根 humanus 杜撰的。其实,德语该词也不是这位老夫子所独创,早在 15 世纪末,意大利的学生就把教古典语言和文学的先生叫 umanista,把教法律的先生叫 legista,他们所教的课程统称为 studia humanita-

tis,英语译为 the humanities,而 humanitas 又源出于 humanitas,意指人性修养<sup>[3]</sup>。而这个有关人性修养的词最早是由古罗马著名的教育家西塞罗为了形容适合于雄辩术的全面教育而从拉丁文中找到的,“他所根据的是希腊人的这个观点:这是发扬那些纯粹属于人和人性的品质的途径”<sup>[3]</sup>。简而言之,人文主义就是要将人培养成人,让人更符合作为一个人的存在。

著名历史学家布洛克曾为自己在面对关于人文主义纷繁复杂的定义时,将人文主义视为西方文化的一种传统,他认为人文主义被一代代的思想家作为一种悠久的传统,以思想不断发展和进化的方式进行传承,“我用这个名词的含义不是指有意识地处理一种一成不变的信念或实践,而是认出——常常是在身后——某些思想和假设之间的血缘关系,比如在彼特拉克身上认出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在洛克身上认出十八世纪的哲学家,在边沁和柯勒律治身上认出穆勒,在歌德身上认出托马斯·曼,在蒙田身上认出威廉·詹姆斯”<sup>[3]</sup>。因此,人文作为一种理想并非从古至今岿然不动,它的思想内核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得以继承,而这个思想内核早在古希腊时就已经被毫无异议地保留和确立,因为“按照希腊人的想法,理想的人、真正的人,就是自由的人。所以,整个西方的人文传统自始至终贯穿着‘自由’的理念”<sup>[4]</sup>。

自由到底是什么?“自由不是人特有的一种能力,而就是人的存在方式本身。自由的存在方式是‘为自己的存在方式’<sup>[5]</sup>。究竟应该如何来理解这种关于人特有的存在方式呢?在西方思想史中,一般存在着政治、宗教和哲学三种意义上对自由的理

收稿日期:2009-11-2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研究”(编号:07JJD880236)。

作者简介:李力,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2008 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史研究。

解,无论从哪个层面来思考,自由都会有纷繁复杂的定义,很难找到被公认的关于自由的定义。作为西方哲学史中众多关键词之一的自由,最终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阐释,“人的自由可以看作是人在活动中通过认识和利用必然表现出的一种自觉、自为、自主的状态,自由活动就是自觉的、自为的、自主的活动”<sup>[6]</sup>。而这种自由活动又恰恰是通过作为活动主体的人本身才得以体现,我们知道,“人是人的最高本质”<sup>[7]</sup>,而“人的类本性,也就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规定性,区别于动物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规定性。因而,人的类本性也是人作为人的基本规定性”<sup>[8]241</sup>。人的类本性在不同的时期曾被做过不同的规定,例如,在中世纪,神性被置于人的理性之上成为人自身的规定性,而决不许有任何的惶惑和质疑,此时神性就可以视为是人的类本性,而标榜“我思故我在”的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则将人的理性作为自我存在的最主要根基,此时理性就被视为人的类本性。因此,“衡量某一种规定性是不是人的类本性,有一个办法,就是看它对于人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而言,是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即不可或缺的条件。根据这样一个办法,自由堪称人的类本性之一。因为,历史经验表明,缺少了自由,人就被异化成了奴隶——一种会说话的动物……简而言之,自由是人的类本性”<sup>[8]242</sup>。

至此可以看出,正是基于自由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条件这个无可辩驳的事实,自古希腊至今的众多思想家一直坚信和倡导塑造和培养人性的人文主义及以其为主旨的人文教育,这也是将人文教育称作 liberal education 和将文科称为 liberal art 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自由就必然成为人文的哲学本质。

## 二、理性:科学的哲学本质

“今天我们讲科学,首先当然是指近代科学,而近代科学首先又是指近代自然科学”。虽然近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最早也要在 16 世纪才会出现<sup>[11]</sup>,但是,毫无疑问,“现代科学是在一种深深浸染了理性观念的文化环境中诞生和成长的。然而,这一理性观念本质上立足于西方从希腊文明承袭下来的哲学基础”<sup>[9]</sup>。其实,让·拉特利尔已经指出科学作为一种理性观念与古希腊哲学先天具有的某种内在本质联系,而这也意味着在反思科学的本源的同时必然要涉及对于理性的追问。

“英文的 science,法文的 science,德文的 wissenschaft 含义并不完全一样,它们都来自拉丁文的 scientia,但或多或少有所转义。拉丁文的 scientia 继承了希腊文 episteme 的含义,其意思是‘知识’、‘学问’”<sup>[10]</sup>。其中,英文的“科学”主要指的是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而德文的科学则基本上继承了希腊和拉丁文的传统,专指整体意义上的知识和学问。

也就是说,最早形成的关于人类和自然的完备知识和学问从一开始就以科学来命名,而这种整体上的知识和学问又正是古希腊哲学本身所努力追求的包容无限的精神,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发掘‘观念’的‘内在性’来实现的,这种观念的内在性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理性”<sup>[10]</sup>。因此,近代科学得以兴起的根本内在原因正是在于长期理性精神的熏陶。后来,作为哲学思潮的科学主义也正是在秉持以理性为主导的前提下逐渐地形成和发展,“随着近代科学的确立和近代科学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基于近代科学而发展起来的技术应用和工业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一种以对于科学及其方法的确信,对科学的文化及其传统的热情为基础的意识形态逐渐形成,这就是被称之为科学主义的思潮”<sup>[11]</sup>。特别是由于科学主义极端偏执地将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奉若神明,所以科学主义自产生以来也一直处于不断的争议之中,至今没有统一和公认的定义。坚持以理性作为自己认识和观察世界的思维和认知方式,以及对于理性的不懈追求,可以说是科学自产生以来就具有的传统和本质。抛开诸如笛卡尔等所追求的所谓纯粹的普遍理性而言,和自由一样,理性可以被视为是人的一种规定性,原因就在于“理性是人的一个基本特征,尽管未必如一些理性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是人的本质或根本特征……(但是)在家庭、学校、社会等各个角落,人们都在过着一种‘合理的’生活”<sup>[8]185</sup>。因此,理性作为人之为人的基本条件之一也是能够成立的。

## 三、理性与功利:两个层面的反思

“事实上,在西方思想史上,尽管有一个从苏格拉底时代以来两千多年或强或弱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传统,但是关于什么是理性,哲学家们却很少有一致的见解”<sup>[8]183</sup>。不仅如此,就连对理性主义本身也存在着分歧,原因就在于,近代以前的西方哲学主要是一种本体论哲学,“本体论是对于存在本身的研究,是对于世界大全的一种根本性看法。在历史上,本体论起过一种作为一切知识的基础的作用”<sup>[12]序言</sup>。而近代以后西方哲学史上一个重大的变化就表现为经验论和唯理论两种认识论的兴起,其中唯理论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理性主义,主要以“法国的笛卡尔、荷兰的斯宾诺莎、德国的莱布尼茨为主要代表,他们都是西欧大陆各国的哲学家,因此也被称为大陆理性主义”<sup>[13]</sup>。由于在认识世界的方式以及对于知识的获取等方面与经验主义针锋相对,因此,理性主义更多地被倾向为是一种经典的认识论。但是,当我们并不从与经验主义对立的角度来看待理性主义时,理性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又属于本体论的范畴,尤其是“随着认识论哲学的成熟,本体论的作用越来越倾向于伦理学方面,尤其在上帝信仰的危机产生之后,本体论是作为人的终极关切的思考而存在的”<sup>[12]序言</sup>。

“功利,英文 Utility,意为有用、功用。这一概念本身就隐含着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功用的主体指向,任何功用都是针对一定主体和主体的一定需要而言的。二是功用的客体指向,即任何功用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总是由隐含着一定的特性的客体所产生的,是客体的一种属性。因此,我们认为,功利是一个关系范畴,而不是一个实体范畴<sup>[14][112]</sup>。以此推论,功利主义也必然要满足功利所具有的这种主客体属性,是基于对主客体双方各自利益的考虑而形成的哲学思潮。对于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人们通常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一术语的:一方面,它是指产生、形成于18世纪下半叶的英国社会,并持续一个世纪之久的、涉及广泛社会生活领域的综合性社会改革运动;另一方面,它是指与那场社会运动相联系并作为其意识形态的强调功用的政治和伦理思想,尤其是指功用主义伦理思想<sup>[15]15</sup>。正是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发展所引发的阶级冲突和利益矛盾使得功利主义顺应了时代的改革要求,并推动了一系列涉及社会各个方面的有效改革,也“正是考虑到功用主义学派运动对社会改革的重要作用,人们才指出,19世纪英国社会的重大改革都可以找到功用主义运动的影响<sup>[15]13</sup>。后来为我们所熟知,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也是在继承功利主义原则的基础上才最终得以形成,“它以哲学的形态体现了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sup>[14]1218</sup>。如果将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在哲学史中加以客观还原,可以分别从认识论和本体论两个方面来对它加以考察。

(一)从认识论方面看,理性主义主要是对于认识能力的批判,它完整地表现为我思故我在的原则的确立,即我可以怀疑一切,但决非像以蒙田为代表的怀疑主义那样将怀疑本身也置于怀疑之中,这样无形之中就极易于导向信仰主义,因此,“笛卡尔说,我在怀疑这件事本身无可怀疑,而怀疑是思想,因此,他说:‘我思,故我在。是第一个确定的,无可怀疑的命题<sup>[12]36</sup>。笛卡尔将我视为思想本身,我作为思维的存在,所以,理性就被设定为人类认识世界和自我的逻辑起点,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依据。随着以强调片面理性为代表的科学的发展,理性逐渐被划分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来看待。价值理性相信的是一定行为的无条件的价值,强调的是动机的纯正和选择正确的手段去实现自己意欲达到的目的,而不管其结果如何。而工具理性则是指行动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行动借助理性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而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简而言之,“所谓工具理性是指旨在优化人们行为手段的认识能力,而价值理性则指那种能够帮助人们正确选择行为目的的认识能力<sup>[8]184</sup>。

而“功利主义的论证是建立在经验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的,这种经验主义的认识论较之为了追求某种绝对真理而诉诸人的天启理性的唯理论认识论

来说,更加合理,也更具有现代性<sup>[16]序言5</sup>。正是基于这种信念,它认为“一切知识的取舍最后都要诉诸人的日常经验而不是诉诸人的理性和上帝,伦理道德的论证也不例外<sup>[16]序言18</sup>。这也是为什么功利主义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自己的终极目的,在各种制度安排上强调实际功效、效用和实际效率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正因为如此,将 Utilitarianism 译为“效用主义”而非“功利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更加符合它本身的内涵。

(二)从本体论方面看,“近代本体论与古希腊哲学中的本体论的根本不同,就在于近代本体论提出了我思故我在为原则,就是说,近代本体论是建立在对于认识的批判的基础上的……质言之,近代本体论是以自我意识为原则的<sup>[12]61</sup>。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近代本体论得以确立正是由于作为认识论的理性主义的兴起。从本体论的视角来考察理性主义,则主要表现在道德哲学(伦理学)方面,即“怀疑意味着对一切外在权威的否定,而我思故我在意味着人存在的根据在于对于一切事情进行独立思考,……意味着要求人作一个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人<sup>[12]172</sup>。正如在前文所述,自由作为人的类本性,是人之为人的前提条件。所以本体论意义上的理性主义最终的落脚点也是着眼于人何以为人的终极思考上来,在这一点上,是理性主义与人文主义在终极目标上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因此,无论是认识论还是本体论,“理性主义精神的核心,即是普遍怀疑和我思故我在<sup>[12]序言</sup>,理应是毫无疑问的。

功利主义在本体论的基础上主要体现为对必然性的追求,“在启蒙运动中,发展起来功利主义和人格主义两种大的道德倾向。功利主义更偏向于规范人的行为,因此,从必然性出发的理论对它是合适的。但笛卡尔派的理性主义者们几乎都把人格完善视为自己的道德目标,因此,他们都从自由出发,而且他们几乎都希望从自由出发建立起自由与必然的统一”<sup>[12]252</sup>。也就是说,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功利主义与科学主义有某种程度的契合,理性主义与人文主义有某种程度的相关。可以说,功利主义与理性主义分别将必然和自由作为自己的规定性正是基于以下的原因,“必然是科学、知识、真理所要达到的最高目标,它们与理性是一致的;而自由是伦理、道德的最高要求,而属于意志的自由与属于理性的必然在这里是不相容的<sup>[12]252~253</sup>。因此,对必然和自由的分别追求和坚持决定了功利主义和理性主义在此一层面的对立。

综上所述,从认识论的角度,对认知方式和认识能力持不同的态度使得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相对立,更进一步考察,正是由于在本体论的基础上,功利主义对必然的诉求以及理性主义对自由的向往最终导致了双方在认识论层面的区别。

#### 四、从哲学思潮的形成反思西方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哲学基础

人文、科学、理性和功利作为哲学范畴呈现在人们的视野并非随意和偶然,而是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性,这种相关性则是由范畴本身的哲学本质和特点所决定,总的说来,可以归纳为自由和理性两个范畴。

(一)自由和理性:哲学思潮的总体属性。自由作为人的基本规定性决定了人文主义理想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原点位置,以及人文教育在根本上得以实现的可能;同样作为人的基本规定性的理性则伴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镜像,在近代科学独立发展以前,更多的是以一种价值理性的方式不断地帮助人努力地实现真正的自由,即当人类不断追求各种价值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就这种价值的价值进行合理性的追问,从而帮助人类实现自己作为真正的价值主体的愿望。因为“首先,理性主义是一种人本主义。从道德方面说,它肯定个体的人的存在权利和人的自由,主张在现世中追求人格的完善”<sup>[12]</sup>。因此,本体论意义上的理性主义或价值理性与人文主义可以统归于自由这个大的范畴之中。

“但是着眼于因果性规律的近代科学,也把理性片面发展成为一种工具理性,因而受到广泛的质疑,认为背离了希腊理性的完整性,而导致了片面的理性”<sup>[10]</sup>。由此才导致了作为一种人类认知方式的科学主义随之兴起,并成为能够左右人类思维和认知的主要力量。关于科学主义也是争论不断,至今没有公认的统一定义,有研究者将对其的态度总地概括为正面也或肯定意义、否定意义或贬义和中性立场<sup>[17]</sup>。这种态度也可以大致划分为弱科学主义、强科学主义和强弱之间的中间状态,其大意是说,强科学主义基本上是科学万能论的翻版,而弱科学主义则是指科学至少是中性的智力活动,科学成果对于人类生存发展有积极作用等<sup>[18]</sup>。总的说来,科学主义只是一种基于对于科学不同认识和态度的认知方式,对它的哲学本质的认同是基于对于科学自身的认同之上,它与科学的最大不同之处,即“科学有它自己的规定性,它的对象是目标客体,更多的是自然世界,而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充其量是一种不系统的哲学思潮,立论更多的是基于一种人类认知方式的,因而两者的区分还是很明显的”<sup>[19]</sup>。也正是由于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大生产及后来的产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于是功利作为一种哲学观念被提出,而偏执于对必然性追求的功利主义则恰恰是对这种外在形势的变化要求的积极回应。因此,在对理性的绝对肯定上而言,功利主义与科学主义或工具理性可以并列于理性这一大的范畴之内。

(二)自由和理性:西方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哲学基础。“高等教育是一个历史的概念”<sup>[20]</sup>。这种历

史性最主要的表现为,高等教育的内涵和外延一直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和变化,这种变化很明显地表现为高等教育的近代化过程,而主导这种近代化走向的正是以集中反映四种哲学思潮属性的自由和理性作为其内在的哲学基础。

1. “在近代科学技术和社会政治制度等因素影响下,自1789年开始,欧洲高等教育逐步进入近代化阶段”<sup>[21]</sup>。这个阶段主要体现为以法国、德国和英国为代表的高等教育近代化的过程中,之所以以1789年作为高等教育近代化的起始,原因就在于经历了大革命之后,法国关闭了中世纪时期的所有大学,并且于1794~1795年分别开创性地设置了完全不同于传统大学的专门学院和综合性工科学院;紧随其后的德国则表现为洪堡于1810年建立了柏林大学,而英国则在1826年建立了有别于牛津和剑桥的伦敦大学,而且上述这些新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在机构功能、培养目标、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根本不同于中世纪大学,这一近代化的过程一直持续到1914年结束。

“近代大学之所以是近代的,最根本的动力与标志就是科学技术以知识的形态,转化为课程进入大学,成为大学内部的核心,推动大学自身方方面面的变化与发展”<sup>[21]</sup>。可以说,由于这种课程所发生的本质变化,“以及这种质变所引起的高等教育机构内部平衡的打破、结构的调整、类型的转换、体制的变革,从而最终导致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形成”<sup>[21]</sup>。这种变化也明显地体现为像伦敦大学之类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的出现,例如,功利学派的奠基人边沁就被伦敦大学视为建校先驱之一<sup>[22]</sup>。而隐藏于大学设置科学课程以及新型高等教育机构的出现背后的根本因素,其实正是由于近代自然科学,乃至大学得以产生的哲学基础——理性一直被不懈诉求的原因所在,众所周知,最早的巴黎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正是缘于对知识和理性的渴望才得以出现的学人生活社区,可以说,“巴黎和博洛尼亚创造了现代世界的大学传统,这个传统属于我们所有的高等知识机构,不管是最老的还是最新的”<sup>[23]</sup>,而且自科学以课程的形态进入大学之后,大学也同样加速了科学自身的规范性。大学的这种影响其实在高等教育近代化以前就已经初现端倪,早在16、17世纪时期使科学远远凌驾于欧洲各种潮流之上的特点之一就是当时的大学<sup>[13]</sup>。伴随着高等教育近代化的不断深入,这种相互影响的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科学得以建制化,“科学建制化的实质是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的一体化,而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则是这种一体化发展的桥梁”<sup>[20]</sup>。因此,作为大学范型产生基础的理性,同样也可以视为是使高等教育转向近代的一种哲学基础。

2 以自由作为哲学本质的人文主义在与科学主义抗衡的同时,也在持续地影响着高等教育的近代化进程,最终使得自由和理性共同成为制约和影响

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哲学基础。

(1)这种源于古希腊的自由理念以人文主义传统的形式表现在人文主义者对大学的认识和理解中。出于对自由传统的向往,“对思想塑造生活的力量和个人自我修养(Bildung)的能力有着共同的信仰,认为个人可以修养到自己的内心冲突得到克服而与同胞和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程度”。作为新人文主义代表的洪堡“比任何人都做了更多的事来把Bildung概念制度化”<sup>[15]</sup>。最明显的体现就是柏林大学的创办。“洪堡首先强调,新大学的本质是客观的学问(Wissenschaft)与主观的教养(Bildung)相结合”<sup>[15]</sup>。为了更好地实践这一理念,他进而认为:“孤独和自由是实现这一理念的前提条件,教学和研究相结合是基本办学原则。”<sup>[16]</sup>这一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的经典理念至今仍然滋润着现代大学的成长。

(2)崇尚古典的人文教育也一直伴随着高等教育近代化的进程。英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过程就很可能说明这一问题。阿什比曾经指出:“英国的高等教育却受牛津和剑桥两大学的影响支配。英国的大学威信集中在这两个中心,而德国大学从来就没有这种情况。”<sup>[25]</sup>而导致这种特有情况出现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牛津和剑桥两校很明显地认为设立大学是为给教会和政府培养服务人员,即培养有教养的人,而不是知识分子。就大学毕业生而言,具有教养比具有高深学识更为重要”<sup>[26]</sup>。这种办学理念反映到课程设置上就以古典的自由教育为目的,“这种所谓的自由教育主要由古典的语言和文学作为课程的核心内容,旨在培养区别于普通大众的精英阶层”<sup>[21]</sup>。尽管后来出现了开启英国高等教育近代化进程的伦敦大学以及旨在提供职业教育服务当地经济的城市大学,但是,人文教育作为对实现自由人的理想的经典方式仍然是高等教育近代化,甚至现代化中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

#### 参考文献:

- [1][英]A·N·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M].何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 [2]郝文武.作为反思教育思想前提的教育哲学[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 [3][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M].董乐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 [4]吴国盛.科学与人文[J].中国社会科学,2001,(4).
- [5]吴国盛.技术与人文[J].北京社会科学,2001,(2).
- [6]袁贵仁.马克思的人学思想[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215.
-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 [8]石中英.教育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 [9][法]让·拉特利尔.科学和技术对文化的挑战[M].吕乃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
- [10]吴国盛.什么是科学[J].博览群书,2007,(10).
- [11]刘兵.从科学主义到人文主义[J].史学月刊,2007,(9).
- [12]陈宣良.理性主义[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 [13]陈修斋.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前言.
- [14]吕世荣.义利观研究[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
- [15]件京辉.英国功用主义伦理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16][英]约翰·穆勒.功利主义[M].徐大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 [17]曾欢.国外科学主义研究述评[J].哲学动态,2007,(2).
- [18]刘华杰.什么是科学主义[J].民主与科学,2000,(3).
- [19]李侠.简析科学、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4,(6).
- [20]潘懋元.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 [21]黄福涛.欧洲高等教育近代化——法、英、德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形成[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
- [22]王承绪.伦敦大学[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17.
- [23][美]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思.大学的兴起[M].王建妮,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3.
- [24]黄福涛.外国高等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 [25]Eric Ashby. The futur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dea of a university[J]. Minerva, 1967,(6).
- [26][英]阿什比.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M].滕大春,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9.

[责任编辑:吴井泉]